

山西文史资料



2000.3

钱伟长自述

(续)

中共中央北方局第四十六

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山西临汾学院

ISSN 1004-5910



9 771004 591009

需要强化的作用

■ 孙 青

政协文史资料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上述四点,是否就概括了文史资料的全部主要作用呢?笔者认为还没有,没有把它的主要作用全部概括进去。当读了发表在本刊的《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后,更相信文史资料还应标明“战斗”这项作用。

文史资料的战斗作用,是历来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当年周恩来总理领导这项事业的时候,就曾说过:“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在旧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这里所提倡的“叛逆精神”,“暴露旧的东西”,就是一种战斗,新的对于旧的战斗。

文史资料的战斗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揭露一段历史的沉沉黑暗和冤气,暴露反动叛逆犯罪行为的历史是战斗。揭开对大跃进或罪恶的事实真相是战斗。用大量事实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这一真理也是战斗。标榜了战斗这种作用,文史资料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更会高涨起来。它因为有了战斗作用,能吸引之史,使革命老前辈和青年同志的笔头,把更富有人性的东西,把许多令人感动受教育的东西。

文史资料的战斗作用,在和平建设年代,常常是表现得更加鲜明的。我国自有的民族史书或史学著作,塑造“太愿五百元人”神功的时候,本刊发表了“近五元人”的调查报告,暴露了其欺骗性,使人的眼睛亮之一亮。抱着爱国主义反侵略的当代一些日本人睁眼瞎说,死不承认日军侵占南京屠杀30余万无辜民众这一血腥罪行时,文史资料用真实的充满血泪控诉的材料,回忆录以及当年记者的采访、摄影和外国人士的

日记,给以强有力的反驳和揭露,使人看到了当年侵略者野蛮无比的残忍和凶恶,认清这些日本人为昨天那些侵略者涂脂抹粉,复活招魂的险恶用心和狰狞面目。

具有战斗作用和传统的政协文史资料,参加揭露黑暗旧社会 and 凶残侵略者的战斗,已为历史所肯定,进而参加当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间的斗争,更为现实所必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阳光普照的新中国是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发展壮大,山后般建立在世界东方的。在低潮时期大仗仗的侵略,阻止过潜伏特务的破坏,粉碎过叛徒漏网的谣言,揭穿过翻覆破坏的阴谋,无限潮言就散穿了。明枪暗箭被避过了,但国际反动势力仍不甘心失败,想方设法诋毁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更空心思企图抹杀新中国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美国国际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而最恶毒的《考克斯报告》,就是最典型、最恶劣、最恶毒的一例。这份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特务报告,采用歪曲事实,移花接木,主观臆断,捕风捉影,蛊惑人心的种种卑劣手段,危言耸听地攻击中国“窃听器”了美国所有最先进的热核弹头机密情报及火箭等技术。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一致谴责。当此之时,政协文史资料有义务、有责任,用事实真相驳斥歪曲恶毒的无耻谎言,用无可辩驳的史实揭露反动势力的险恶用心。本期的《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就是为参加这还有重大影响的战斗而及时编发的。

实践已经证明,战斗性是政协文史资料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不能削弱,只能强化。当这项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我们相信,政协文史资料事业就变得更加兴旺,更有前途!

1999年12月30日

山西文史资料

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
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上)
逃亡中的婉容皇后
峥嵘岁月



主管:

山西省政协

主办: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主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执行编辑:

周志清

广告发行部主任:

王书福

通讯地址:

山西太原东缉虎营 35 号

邮编:

030074

电话:

0351-3045471 转 3116, 3119

定价:

5.80 元

2A56/40
山西文史资料

本刊专稿 钱伟长自述

● 刊首寄语

需要强化的作用

祖 肖 1

● 世纪回眸

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上)

兆 岩 4

逃亡中的婉容皇后

东 曙 53

● 峥嵘岁月

叶挺等烈士遇难见闻录

刘炳星 44

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 王士廉 董魁生 42

● 共和国脚步

长子县的镇反运动

柴贺智等 37

电台工作琐忆

郭思俊 62

● 民国档案

晋北之战亲历记

孙名泉 45

旧临汾的妓院

梁正岗 60

● 人物与回忆

SHANXI WENSHI ZILIAO

目

2000年3月 总第129期

录

钱伟长自述(续)

钱伟长 20

他曾转战山西

王宝成 15

● 史海揭秘

伪满在关内的两个大使馆

董岩春 39

阎日勾结的联络点——僧念村

逯丁艺 52

● 文史拾遗

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纪略

霍效昌 51

● 文史月报

侵华日军在亚洲的最大军事要塞

63

洪洞女娲皇陵

63

隰县发现活体殉葬墓

63

浮山有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

64

十行神秘文字无法解读

64

北京发现曹雪芹旧居

64

明代尊曹碑

64

国内外总发行:

《山西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14-1023/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591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1400004000278

印刷:

太原市财苑印刷厂

美编策划:

叶 子

封一主题照:

亨隆钢铁公司车间夜景和山

西省劳动模范、该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苏明月同志

封二:

亨隆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封三:

在改革中发展的翼城中学

封四

方兴未艾的翼城保险业

设计制作:

书海工作室

中国

“两弹一星”研制纪事

(上)

● 兆 岩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宣布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民有站在世界科技进步前列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我们要始终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埋头苦干，迎头追赶，努力使我国的科技事业继续实现新的飞跃。

这次表彰大会可以说是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40余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是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和弘扬。在对“两弹一星”发展进程的回顾中，我们会感到它进取的每一步路都是一首绝妙的诗，它登攀的每一道坎都有一幅奇美的风景，甚至它的每一件小事都具有秘闻般的诱惑力。

蘑菇云这样升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挥舞核大棒。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指导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来自法国的一份特殊礼物——镭盐。这是1951年10月，中国放射化学家杨宗宗将要回国投身祖国建设时，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和居里夫人托他带回的，并对他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当毛泽东收到居里夫妇亲手制做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时，感慨万千，说道：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这个东西。

1954年，中国地质学家把第一次在广西发现的铀矿标本，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兴奋异常地

说：“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5年1月15日，皑皑白雪覆盖北京，中南海湖面结有一层薄冰。然而，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场，却暖意融融，像是春天提早来到了这里。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向会议作了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汇报，当盖革计数器探测到铀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会场上发出阵阵欢笑。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他认为，为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我们不肯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发展原子能，“现在到時候了，該抓了。”“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这是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战略决策的一次会议，是我国核工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块里程碑。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了陈云、聂荣臻、薄一波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谈判，先后签订了6个协议。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同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通过决议设立三机部（1958年改为二机部），负责中国核工业，首任部长为宋任穷。同时，组成领导小组，加快培养原子能技术人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相关的系和研究室，并派遣了留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学习。

1957年，中苏两国签订协议，苏联应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而苏联为把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置于其“核保护伞”下加以控制，为独自掌握关键技术，迟迟不履行协议。

1958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建成，并启动成功，共和国的核装置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改名为原子能所，成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技研究基地。核燃料厂、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也于此时相继在兰州、酒泉和包头等地动工。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

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想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同年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宣告成立。

我国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是由当时国际形势逼出来的。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座繁华的城市顷刻间化成废墟。苏联认为日本升起的这两朵蘑菇云，是给它的警告，明天它也可能遭到这种袭击。于是斯大林放弃了长期以来对美国研制原子弹有关情报真实性的怀疑，几天之后成立了以贝利亚为主席的研制核武器的专门委员会，并规定了最后期限，5年时间必须研制出原子弹。在库尔恰托夫、多列扎利等科学家努力下，仅用4年时间，于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用“内爆法”，即在装有钚的球体周围放放了32个爆炸装置，引爆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从此，核竞赛开始了。1952年10月3日，英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同年10月31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1953年8月12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美苏间既争又勾结的斗争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都处在核武器的阴霾之下。而在此时，作为发明过火药、火箭的泱泱大国，我国对原子弹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

就在核军备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一批立志报效祖国的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汇拢到铸造民族族盾牌的旗帜之下。

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于1937年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进修镭学，开始了核物理研究的艰苦跋涉。他和他的合作者、夫人何泽慧，从核裂变时两头重、中间轻的现象出发，进行数万次观测，终于发现约300个核裂变中就有一个分裂为三块，这就是三分裂现象。这一成果和由何泽慧第一个发现的四分裂现象，被居里夫妇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1948年，钱三强夫妇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抱着

刚刚半岁的女儿，毅然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感到发展科学的春天来了，1953年就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于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工作，制定研究发展规划，确定研究课题，建设研究基地，组织研究队伍，许多重要研究活动，他都亲自参与和指导。因为他对原子弹、氢弹研究和我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当之无愧的。

也有“中国两弹之父”称誉的一代科学大师王淦昌，是江南常熟县支塘镇人，少年时考入上海著名的浦东中学，1925年考进清华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之后又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的官费研究生。他进入柏林大学，师从被爱因斯坦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挽留回到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56年秋，在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王淦昌奉命与物理学界后起之秀的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赴苏联，到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该所副所长。三年后，又奉绝密电示回到国内，根据二机部部长刘杰和老朋友钱三强的要求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他化名“王京”，在青海金银滩从事研究工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他又参加中国氢弹的研制工作，获得了一个个惊人成果。1998年12月27日因胃癌而仙逝，一周年后其家属拿出50万元设立了王淦昌物理奖，以奖励我国在粒子物理学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贡献突出者。有成批这样的人物，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是必定无疑的。

代号“596”工程与苏联来信绝援。聂荣臻说：“一定要争口气。”毛泽东更为风趣地说道：“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功勋章。”

1958年，由三机部改为二机部所成立的九局，即后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担原子弹和氢弹的

研制任务，导弹由国防部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负责，中国科学院承担原子弹、氢弹的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多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为了尽早把原子弹搞出来，三个科研单位真正拧成了一股绳，人才相互抽调，器材相互借用，难题共同攻关。

一天，担任研制原子弹任务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张劲夫家里，说道：“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它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是科学院哪！”

当时，中央已决定把修建在北京中关村的7000千瓦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及其原子能研究所交给二机部，所以张劲夫回答道：“没问题。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它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我们还可以抽一些人给你。如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你需要也可以给你。”

宋任穷走后不久，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作为中科院第一次访苏代表团团长从苏联回来，因为他在调二机部之前当过中科院的学术秘书长，故一见张劲夫，就提意见：“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什么意见？”“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张劲夫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这一讲，钱三强连说：“我懂了，我懂了。”然后又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于是他开始了调兵点将。

他要走了在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搞电子显微镜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中科院数理化部学术秘书、后来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邓稼先，还要走了中科院院刊编辑汪容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还要走了王承书。

后来，钱三强又要走了沈阳金属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此同志对金属蚀有研究，其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他还要走了长春光机研究所的副所长龚祖



同，该同志带一批科技人员在西安建立了西安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在铸造民族核盾牌光辉事业的吸引下，不少学有所成的著名人物从海外回到国内，加入了“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

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组长年从事研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为了能回到祖国，在美国从不参加机密工作，为防止美国阻拦，回国前烧掉了浸溶有自己大量心血的一部未完成书稿。他和王淦昌、彭桓武，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朱光亚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不久，1950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工作，还作为译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1959年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担任技术领导，几十年来把全部心血和才智都献给了核武器的研制事业。

程开甲博士是理论物理学家，回国后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执教，1960年调入中物院从事原子

弹的研究与设计，不久又奉命组建核试验研究基地和队伍，为“两弹一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研制“两弹一星”之初，我国曾争取过苏联的帮助。1957年9月，以聂荣臻元帅为团长，陈赓、宋任穷同志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到苏联谈判。同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9年5月，国防部五院政治委员刘有光率该院代表团访苏，希望尽快得到苏方的图纸资料和设备。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严重变化，1959年6月20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谈判，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撕毁了原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迫使中共中央于当年7月，作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定。同年10月1日，结束了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苏联不能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还带走了所有图纸资料，终止了原定设备的供应。这虽然是件坏事，却同时也是件好事，逼迫中国更自觉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原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催促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强攻关，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于是，苏联撕毁协议这件事，成了我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发明创造、许多重大科技进步、许多惊天动地的科研成果，都是在此之后涌现出来的。对此，毛泽东主席曾十分风趣地说道：“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决定以苏联来信绝援的日子——1959年6月这个被赫鲁晓夫藐视的日子，将原子弹试验工

程命名为代号“596”，要求二机部会同有关部门，为“596”工程的顺利实现奋发工作。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235。毛泽东虽然知道广西发现过铀矿资源苗头，但能否维持制造原子弹心里没底。一天，他把地质部长兼中科院副院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找来，问：“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份只含千分之几。”要从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铀工厂。于是，加快了铀工厂的筹建。

1960年至1962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停止援助，再加上“大跃进”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核工业遇到了巨大困难。不怀好意的赫鲁晓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嘲笑中国，恶狠狠地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都穿不上。”在国内，也出现了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陈毅元帅力主上马，说道：“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搞中国的原子弹！”张爱萍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刘少奇主席主张首先把情况摸清再定，毛泽东认可了这一意见。于是，派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张爱萍组织调查。

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召集会议，对研制原子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然后向中央提出，只要坚持下去，原子弹试验完全可能在3至5年得到突破。二机部根据这一计划，制定了坚持自力更生，争取在1960年至1964年5年内，制成原子弹的任务。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倍努力，加强合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为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具体问题，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日，张爱萍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于11月14日给军委报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 and 急待解决的问题》

的报告。报告认为，我国此工业和核武器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只要中央领导负责，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这个报告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特意接见了核工业会议的代表。邓小平对核工业会议代表们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事，干不好书记处负责。”

张爱萍、刘杰用二机部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正式报告，表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两年规划”，同时组成了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15人为委员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研制试验“两弹一星”工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研制原子弹的攻坚战打响了。

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春天飞沙走石，寒气袭人，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正像张爱萍将军诗中所写：“饥餐沙砾饭，渴饮苦水浆。”试验基地条件的艰苦，出乎人们的想象。就是在如此荒凉艰苦的条件下，万名建设大军住帐篷，盖厂房，修公路，搞科研，为蘑菇云的升起忘我地工作着。

1960年4月开始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年底便已完成，勾勒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大量运算，当时我国尚无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被誉为“娃娃博士”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昼夜计算，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房间。这样先后运算了9次，历时半年，查找出了不少漏洞，消除了不少疑点。这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制原子弹初期，广为人们称道的“九次运算”。1961年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以其深厚的物理功底论证了“九次运算”结果的正确

性。通过运算和论证,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为理论奠定了基础。

中科院有广为称道的“九次运算”,中科院也有“攻克三大技术难关”的美谈。据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劲夫介绍,苏联于1960年撤走专家之后,受损失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因苏联不给关键材料,整个工厂被迫停建停工。那时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这是浓缩铀厂机器运转所必不可少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其它研究所配合下,终于研制了出来。

第二是“真空阀门”。这是原子弹气体原料必备设备,没有它,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钱三强提出这个科研项目后,中科院安排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帮助下,集中力量攻关,终于造出了“真空阀门”。

第三是高能炸药。这是原子弹的引爆装置,没有它,原子弹无法爆炸。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建立了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有于永忠等。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黄耀曾带了一些人前去支援,五机部的一个研究所也派人参加。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高能炸药终于被研制了出来。

毛泽东批准原子弹早试。周恩来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朵蘑菇云从荒凉的中国西部戈壁滩升起

问题在一个一个得到解决,难关在一个一个取得突破。自中央专委会成立之日起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近两年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研制和试验中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各有关单位依照中央专委会的命令,迅速而有成效地开展 works。

1962年,在铀—235取得重要突破后,张爱萍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到新疆罗布泊地区勘察现场。这是片荒无人烟凄凉的土,碎石遍地,戈壁无际,给试验基地定点,在版图上却找不到名字。张爱萍将军说:“名字不是现成的吗?孔雀河边的点就叫‘孔雀开屏’好了,甘草最多的地方就叫‘甘草泉’,机关驻地开满了马兰花,就叫‘马兰’好了。”

就在这新有了名字的戈壁滩上,试验人员安营扎寨,住的一律是干打垒土屋和帐篷,喝的是苦涩的戈壁水,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日子里,还几乎断了炊。聂荣臻看到这些,大声疾呼:“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啊!”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从1963年开始,控制、测试、光学、飞机场、道路、通讯以及102米的试验铁塔等40余项工程都陆续开工,到1964年7月全部完工。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

同年4月,我国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为原子



弹的完成提供了关键条件。

同年6月6日,由九院院长李觉将军组织,由陈能宽担任指挥的最后一次全弹爆轰试验,在青海进行。这次试验,除未装填核材料以外,全部是核爆炸所用实物。为与实弹“热试验”相对应,人们称此为“冷试验”。

同年8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省首府西宁市以北百公里海晏县的金银滩,今叫西海镇“十八甲区”的秘密“二分厂”加工、装配、验收完毕后,用专列运往罗布泊试验基地。

同年9月9日,担任我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和副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

同年9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汇报和研究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当时,国外有人得知中国原子弹技术已经过关,便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就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中国当然不会害怕这种恫吓,但从战略考虑,会议还是提出了核试验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提请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决定。

同年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关于早试的决定,并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就核试验的准备、原子弹的运输、安全、外交斗争等作了部署。

同年10月的一天,核试验现场突然刮起11级大风,安装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摇晃了30个小时,塔顶工作间里有7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恶心想吐。铁塔安装技术总队的王师傅不怕塔摇地晃,把水和面包送了上去,与上面的7个人抱成了一团。用友谊、热情和群体意志焊接起来的巍巍铁塔,终于托起了昆仑惊雷。

10月14日,张爱萍在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



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完毕。

历史性的一天,震惊世界的一天,中华民族异常兴奋和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人员撤离试验现场,基地负责人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普乘坐吉普车到铁塔下,把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插上。据基地气象处报告,整个场区及云迹地带气象转好,总指挥部下令8时完成原子弹装配最后一道工序——由方正知、陈常宣两位专家插上起爆雷管,全体人员撤到主控站。同时,用密语向北京报告。

按照事先约定,15时前接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周恩来手执话筒,等待着那振奋人心的起爆。

下午2时30分,张爱萍向主控站下达开始试验的命令。取样飞机进入指定空域。主控站发出K1指令,发出K2指令,进入自动程序,进入倒计时:“10、9、8、7……1,起爆!”原子弹依照扬声器里的声音,也依序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强光闪耀三秒钟,蘑菇云腾空而起,继而爆发出两声巨响,一个五颜六色的巨大火球,七分钟后就上升到7000至8000米。首次核试验成功了!

几乎是在看到火球的同时,张爱萍兴奋地向颤抖的声音向守在北京电话机旁的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报告:“核爆炸成功了,我们已看到了火球!”总理问:“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

此时，冲天的烟柱与火球衔接成一朵硕大的蘑菇云。张爱萍仰望着火球的上升，又回头问王淦昌，王点头表示肯定，于是向周总理报告说，是核爆炸。周恩来当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说要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主席，同时要求继续报告后续情况。坐在电话机旁的邓颖超同志听到来自试验基地肯定的答复后，忍不住两眼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又接到试验基地的后续报告，汇报的内容是初步试验结果：蘑菇云上升到10300米，8分钟稳定；爆后1小时爆心剂量为7700伦/时；14节铁塔上部7节已消失，下半部扭曲瘫在地面；爆炸威力超过两万吨TNT当量，完全符合设计值。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晚，人民大会堂正在上演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毛泽东、周恩来在舞台上接见演出人员时，向全场观众庄严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场立即欢腾起来。陈毅外长竟然和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抢要套红的《新闻公报》。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巨大胜利》的贺电，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我国政府在声明中郑重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

这次核爆炸的成功，更震惊了世界，世界媒体都相继作了报告。只有苏联除塔斯社发表了一句简讯外，一直沉默无语。

这次核爆炸的成功，结束了中国过去受人欺凌的时代！随蘑菇云所上升的，是人民的豪气，是民族精神的升华。国外一位华人记者在概括海外游子心声时写道：“在海外的中国人眼中，那蘑菇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这话不无道理。

研制氢弹的秘闻

1999年是多事之年，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抛出《考克斯报告》，受到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的反驳。多年秘而不宣的氢弹研制秘闻，始被社会所知晓。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秘闻在报刊上多有披露，而氢弹爆炸的成功除有简短的消息见诸新闻媒体外，细节很少为人们所知晓。一向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一些反动势力，大钻这个空子，造谣惑众，混淆视听，大肆诬蔑，竭力贬低中国人的才智、能力和综合国力。最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抛出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简称《考克斯报告》。

这份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99年美国“三大丑闻”之一的报告，为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不惜采用歪曲事实、移花接木、主观臆断、捕风捉影、造谣生事、蛊惑人心的种种卑劣手法，危言耸听地攻击中国“偷窃”美国所有最先进的热核弹头机密情报，包括W-88、W-87、W-78、W-76、W-70、W-62、W-56等7种热核弹头，并声称：“中国在70年代末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窃取’了美国核弹头W-70(增强辐射弹，又名中子弹)的设计机密，于是在1988年试验了它的中子弹。”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的极大诬蔑，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

《考克斯报告》出笼后，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愤怒声讨，中国科学家纷纷撰文予以揭露，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于1999年5月31日发表谈话，对该报告造出的谣言给以驳斥。同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事实胜于雄辩，流言不攻自破——再驳〈考克斯报告〉》的长篇文章，以犀利的文字，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痛斥了《考克斯报告》。文章说：

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一大批才华横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科学家，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成功地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掌握了核武器技术。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1966年12月28日中国突破了氢弹原理技术，并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核武器

试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卫核反击力量。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美国、苏联两国空前的核军备竞赛,数万枚核弹头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人民头上,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不得不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技术和改善自己的核武器系统,并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中子弹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很神秘,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氢弹。中国作为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技术的国家,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就掌握中子弹技术,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考克斯报告》还说美国做了1000多次核试验,中国只做了45次就能掌握先进弹头技术,因此“猜测”中国一定“窃取了美国的核技术机密。这充分表明考克斯等人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的创造能力,时至今日,还死抱着种族歧视的观点不放。

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批驳是十分有力的,考克斯等人是无言以对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中国,有着外人无法估量的力量和才智,有着比别人聪明数倍、数十倍的杰出科学家。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世界文明古国,文化积淀之深厚和智慧潜力之巨大,是生活在仅有二百余年建国史国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所无法想象、无法预测到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是飞不到鹰的那个高度的,过去数千年是如此,今后若干年也将会如此。45次核试验,能达到和超过1000余次试验所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中国科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搞在考克斯们厚颜无耻脸上的几记响亮的耳光!

1960年钱三强主持“中子物理领导小组”,黄祖洽、于敏、何祚麻等承担研究氢弹任务,1965年10月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中国科学家对于氢弹原理的探索始于1960年底。那年,原子能所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为了研制氢弹,钱三强将黄祖洽、

于敏、何祚麻等组织起来,开始做基础性研究

研制氢弹这个课题,是二机部部长刘杰和钱三强提出的,方案是于敏提出的。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和简陋啊!没有资料,没有可供参考的图纸,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仅有一些桌椅、几把尺子和一块黑板。然而,中国科学家们却有一颗振兴民族火热的心,却有一腔攀登世界科技高峰饱满的热情,却有一副能挑起千斤重任钢铁的肩膀!他们眼睛盯着世界变幻着的风云,心灵牵挂着在世界风雨中祖国的安危,决心用智慧和意志要为祖国铸成一副能抵风挡雨、威力无比的核盾牌!

于敏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从未出国留学过,人们称誉他是“国产专家一号”。在



他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处于巅峰时期,领导安排他研究氢弹理论,他就毅然放弃正在研究的课题,把陌生的、没有任何基础的氢弹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接了过来,全身心地投入。他说:“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他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追求,所以他便很快进入了“角色”,废寝忘食,昼夜探索,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

核弹的研究与设计是离不开大量运算的,计算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钱三强非常感谢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的原子弹和氢弹研究

起了巨大作用。早在1958年8月1日,中科院就研制成功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虽属最低级最原始的计算机,每秒钟仅运算几十次,但比人工计算快了几百倍。1959年9月,中科院研制成了第二台计算机,也是电子管的,每秒运算一万次,当时就对计算量很大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即后来的九院工作起了大作用。又过一段时间,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共同研制成了晶体管的第二代计算机,每秒运算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研究的人员转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和原有的科技人员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攻克氢弹研制难关的一只有力拳头。在这期间,彭桓武加入进来,邓稼先加入进来,1961年从苏联回国的周光召也加入进来。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1961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任中级研究员,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并建立了相应的教学方法。为发展中国的核事业,他请命回国,参加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参与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中子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因其贡献突出,被外国科学家誉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被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协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有如此多的优秀科学家加入到氢弹研究中来,难题就没有不被攻克的。在那段日子里,中物院理论部科研大楼,白天人们伏案工作,夜晚灯火辉煌。报告厅也热闹非凡,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接连不断地举行报告会,众多的研究者和听众把报告厅拥得水泄不通。

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1965年10月,我国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在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

又一个应该永远记住的日子到来了!又一个神奇巨光将要照耀世界、照耀历史——

1967年6月17日,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的72号轰炸机,披着熹微的晨光冲上蓝天。驾驶员们看到,眼前的天是这么样的蓝,蓝得像柔和的海洋,脚下的地是这么样的宽,宽得无边无际。这高天、这阔地真是太好了,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展示中国人、中国科学家的风姿和伟力!

飞机在高空上盘旋,寻觅着空投的目标。

飞机在高空上呼啸,期待着空投的指令。

晨7时,徐克江听到了指令,中国第一颗氢弹离开飞机,稳稳下垂。沉寂阔大的戈壁猛地一震,像山呼海啸,一瞬间,一团巨大的烟云,一颗壮观的“太阳”,升起在大漠的上空。

氢弹试验成功了!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理论突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半,而我们仅仅用了2年零2个月!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矫健进行的步伐,别人是无法追赶的!

邓小平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用战略核武器打现代游击战争。”身患癌症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心神领会,提出核武器小型化的报告。

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也加快了我国中子弹的研究。

中子弹是一种特殊的氢弹,是增强辐射弹,并不神秘。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1964年,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就提出激光核聚变的初步概念,这在国际上属最早的独立提出者之一。

1973年,我国采用一路激光驱动氘冰,在实验上观察到了中子。

1974年,采用一路激光驱动聚氘乙烯靶发生核



反应，并在实验上观察到氘氚反应产生的中子。

1986年，采用直接驱动方式使氘氚玻璃靶球（CAPSVLE）出中子。

1990—1992年间，用间接驱动方式实现热核聚变反应，观察到了热核中子。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于敏院士和他领导的一批中国科学家，在7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激光通过入射口，打进重金属外壳包围的空腔，以X光辐射驱动方式实现激光聚变的构想，并提出了在柱形黑腔中心放置靶丸的结构设计。接着，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建造了自己的用于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激光器——神光装置。

后来，从美国解密的资料中发现，中美科学家在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几乎同时提出了上述相类似的概念。这说明客观存在的科学规律，不管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途径，迟早是会被人类掌握的。

中子的发现与研究，显然给我国核武器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因此，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于1999年7月15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早在七八十年代，就相继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80年代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繁盛期，是其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性阶段。邓小平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用战略核武器打现代游击战争。”他把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目标定在了小型化和灵活机动上。

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科学家，是能深刻领会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深知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极度虚弱的身体已不能支撑他实现自己的全部愿望，但他还是不能放松自己的事业，而是与命运抗争，与生命赛跑，用超人的意志忍受着化疗带来的痛苦，用崇高的责任感鞭策自己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在病床上，邓稼先不能允许自己停止工作，而把于敏、中物院院长胡仁宇和胡思得等科学家请到病榻前，多次分析世界各国军事动态，分析我国核试验的发展状况和与国外的差距，一道起草和修改报告，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建议。最后一次大手术前，邓稼先仍吃力执笔，就报告内容的调整写满了两页大纸，还对文

字作了润色。当他用颤抖的手在报告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时，他手心里沁满了汗，脸上绽出了笑容。这份建议成了他生命的绝唱，却又是推动我国核武器小型化进程的重要文献。

核武器小型化，是提高核威慑能力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实现这一点，既在于科学家们精巧的设计，测试技术等多方面的突破，也在于加工的精确和操作的熟练。在这方面，活跃在第一线的技术工人付出了多少牺牲和艰辛的劳动呵！有的长年远离家乡，把青春年华奉献在荒凉的大漠和寂寞的深山。有的身患大病，却咬着牙顽强地守在各类仪器周围。有的忍受着绝症的折磨，却不愿离开火热的第一线工作。

地下核试验要将测试探头深潜几百米深的水井中，耐高压和密封是个要求甚严的问题。负责近区测试的同志不惧白天如火的高温，夜晚滴水成冰的寒冷，守护在浇灌水泥的现场，以保证每一根探头完好无损，测到试验的准确数据。

在一次核试验中，现场的测试车后轴被震断了，若不及时将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将质一旦衰减，所需数据丢失，那就将严重影响到试验测试的结果。中物院副院长唐惠龙毫不考虑试验现场对人体有害的大剂量放射性，立刻组织抢险。在18位勇士的努力下，测试车被抢出，宝贵的试验数据得到了保存。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要了。”

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使我国的核武器由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走向了小型化。

这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进步的一座座丰碑！

这是矗立在我国国防国门前的一道道铁壁！

这是高擎在祖国母亲手中的一张张盾牌！

唯有站起来的民族才能获得这样的盾牌，唯有拥有这盾牌的民族才能免受侵略和欺压。

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还将继续说明这一点。（待续）

1999年12月27日傍晚

走上革命道路

他
曾
转
战
山
西

刘聚奎传略

王宝成

已故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刘聚奎同志(1910—1984),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他早年投身革命,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诸多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勤勤恳恳,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坎坷,无怨无悔,意志更坚。他逝世后,胡耀邦以老上级和老战友的名义致电哀悼。

刘聚奎,号星五,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河内县(1913年改名沁阳县)柏山村(1929年后改属博爱县)一个农民的家庭。祖父及父亲以农耕为业,兼营缸窑、香木生意,家境较为富裕。父亲刘传周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仗义疏财,是当地一位爱国、正直、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

刘聚奎少年时期聪颖好学,记忆力强,6岁(1916年)入本村福岩寺私塾读书,1919年私塾废除后进村办国民学校念初中,1922年夏考入本县许良镇西广高小就读,1924年春转入老君庙高小,1925年夏考入沁阳县城的省立第十三中学初中部继续学习,1926年5月辍学回家帮父亲经营缸窑。这期间,他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始接触和认识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和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现状尤为愤怒,逐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

为了完成未竟的学业,以便将来报效国家,1929年9月,刘聚奎离开家乡,考入省会开封的私立嵩阳中学,在初中二年级插班,继续读书求学。在学校,他刻苦努力,数学、语文、史地、英文等科目门门优秀。1930年是刘聚奎人生的转折时期,这一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缓解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日趋衰微;同年4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战,这次规模空前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使得中原诸省广大人民倍受灾难。面对内忧外患,年轻的刘聚奎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充满忧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失望,通过学校进步人士的宣传,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和其它进步读物,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的情况,逐渐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1930年8月,刘聚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反帝大同盟,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0年秋,刘聚奎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开封)第一中学读高中,该校是所红色学校,进步思想盛行,共产党人杨献珍在此教高中的经济学。由于刘聚奎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纯洁、勇敢、追求进步,因此深得杨献珍赏识,经常邀其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同年10月,刘聚奎因积极参加青年反帝大同盟组织

的学潮、印发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被河南省警察厅逮捕，由于没有证据，1931年1月，警察厅将他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学生释放，但校方仍把他们开除了。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五年

为了寻找中共党组织，1931年春节过后，刘聚奎离开家乡来到北平（今北京），进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作旁听生。不久，经介绍，他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基层一个支部的书记（团员主要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及私立中国大学的学生）。同年6月上中旬，中共河北（原顺直）省委军委在刘聚奎居住的河南会馆小院内秘密举办了一期团员兵运工作训练班，省委书记殷鉴、宣传部长阮啸仙、军委书记廖化平、军委秘书薄一波等人分别讲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以及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问题。6月下旬，由于廖化平等人的叛变和出卖，中共河北省委及北平、天津两个市委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聚奎与殷鉴、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共产党人相继被东北军（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8月，又一同被押解到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军法处。审讯期间，在生与死、革命与背叛的严峻考验面前，为掩护革命战友和党的领导同志，他不为利诱，不惧严刑，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浩然正气，在法庭上和看守所中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9月下旬，他被判处五年零八个月的有期徒刑，与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人一起转至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关押。

在监狱关押的五年多时间里，刘聚奎始终保持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在监狱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薄一波）的领导下，挫败了狱方一次次“反省”政策的进攻。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为民族为人民，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才不愧父母养自己一场。”1933年春，监狱当局企图用假枪毙的花招逼迫刘聚奎和另外三位同志“反省”、“转变”，但一无所获，最后恼羞成怒地把他们严刑拷打了一顿。鉴于刘聚奎在审讯和关押期间的英勇表现，监狱中共地下支部于1933年批准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宣誓中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丢。”他认真执行支部的决议

决定，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的同狱方的斗争。1934年12月，他和60多名政治犯进行了长达7天的绝食斗争，反对监狱当局的虐待和迫害，迫使当局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等条件。这期间，他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和其它书籍，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36年秋，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干部的需要，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报经中央批准后，向监狱中共地下支部发出指示，要求狱中的共产党员按照监狱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为党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从这年8月31日起，包括刘聚奎在内的57名共产党员分批走出监狱（刘聚奎出狱时间是10月24日）。刘聚奎出狱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彭真找他和其他4位同志谈话，指示他们到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河南省开展工作。

在晋冀豫、冀鲁豫、太岳和豫西抗日战场

刘聚奎返回河南后，根据中共河南省工委的指示，在家乡豫北地区秘密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聚奎积极宣传抗日政策，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活动；9月任新成立的中共豫北工委（10月改称豫北特委）组织委员。1938年3月日军侵占豫北后，他组建河北民军太行南区游击第六支队并任支队长；5月，六支队与一、四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豫北道清抗日游击队（不久改为游击支队），他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指导员；10月，道清游击支队与修武县抗日民军县政府大队合并组成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独立游击支队（兼第五军分区）第二大队，他任政治部副主任（无正职）。这期间，他率部在豫北地区特别是滑县与博爱间的道（口）清（化）铁路西段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受到刘伯承师长的表扬。同年12月，国民党豫北当局策动袭击第二大队酿成许河事件后，他和大队其他领导率余部离开豫北，转移到晋东南陵川县进行整训。

1939年1月以后，刘聚奎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所属晋冀豫边区游击司令部晋豫军分区支队教导员、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大队政委。1940年4月，独立游击支队改编并入八路军第二